探索人文与经济共荣共生的齐鲁样本

□ 洪俊杰 郭健

第1落点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这一重大命题，蕴含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法，高度契合我国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刻认识和深入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和实践发展，对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阐释，加快建构起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人文经济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导，以人、文、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其一，突破西方发展模式困境的时代需求。西方经济学以“个体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忽视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偏重量化增长而忽视人的情感需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难以解决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危机等全球性发展难题，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测性愈显不足。人文经济学，把人的社会性、文化性纳入范畴，超越西方理论模式，成为一种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范式。

其二，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转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模式。人文经济学强调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相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正是回应这一矛盾转化的理论自觉。

其三，增强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人文经济学的主旨要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发展深度融合，让文化从“软实力”变为“硬支撑”，从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人文经济学指导我们通过文化赋能产业、人文浸润社会、价值引领发展，并通过经济增长支撑文化繁荣实现双向循环正向

互促，推动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发展。

人文与经济互动的中国实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城市作为文明传承的空间载体，不仅记录着文化变迁与人类活动的轨迹，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资源。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往往能够通过系统性的品牌塑造，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要素，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财经大学团队以全国293个地级市纳入中华文化圈的时间长度作为文化积淀的代理变量，分析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积淀时间越长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印证了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而持续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揭示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背后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与资源条件，我们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视为一项文化制度供给与顶层设计实践，基于科学方法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入选历史文化名城显著提升城市的经济增长，机制主要包括促进文化旅游发展、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优化地方治理环境。该政策效应呈现明显的动态增强特征，从第5年开始显著上升，至第10年达到峰值，表明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非即时显现，而是一个需要积累与融合的过程。同时，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是等不来靠不来的，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高度依赖一个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资源配套以及市场条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智能算法、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广泛应用，在带来效率革命性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个体尊严模糊、价值判断削弱等“人文缺失”风险。这迫切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技术进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向未来的人文经济学研究，应该将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宏观影响与微观效应纳入议程，积极回应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坚守人的主体性、发挥人的能动性、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新命题，关注“共情性制度设计”“数据伦理治理”与“算法价值校正”等重要方向，加强跨学科协同，将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深度嵌入技术系统的设计流程，并完善与之配套的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机制。同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和丛林法则交替进行，全球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公平赤字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推动发展回归人文本源，以合作促发展、共同进步，显得尤为迫切。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国际意义。

齐鲁大地上的鲜活案例

齐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之一，齐鲁大地孕育了孔子、孟子、荀子、管子、墨子等众多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深入挖掘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孔子以“仁”为核心构建的思想体系，强调“爱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价值观上的共鸣。孔子倡导的“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智慧，强调在矛盾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符合客观规律与现实需求的平衡点。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理念，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化表达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底蕴，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度融合。孟子强调的“制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主张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主张“先义后利”“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引导经济主体恪守道德伦理、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前整治“内卷”式竞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古人智慧。

荀子提出“礼法并施”，强调“礼”的教化功能与“法”的规范作用相结合，这对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同时倡导“制天命而用之”，主张人应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这一“天人相分”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原理遥相呼应。

《管子》一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涉及经济，《管子》经济思想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宗旨，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逻辑起点，通过“轻重之术”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最终实现强国目标，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时代先进性。管子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理念及其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改革创新特点。

墨子及其学派在几何学、物理学、光学、数学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墨子秉持科学态度（“三表法”）和实践精神（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强调科技“利人”的目的论，他的科技观和科技成果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一座高峰。

总之，齐鲁文化中蕴藏的先哲智慧，是“第二个结合”的宝贵资源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实现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命题。以文化“两创”激发新动能，曲阜、邹城、临淄等地已有鲜活的案例实践。

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紧紧围绕“仁爱”“礼乐”“中庸”等核心思想，构建起文化整体赋能与基层治理创新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当地率先实施“一村一名儒学讲师”，持续深化“百姓儒学”工程，推动儒家经典融入日常生活，将“和合”“诚信”理念嵌入基层治理结构，建立“美德信用”体系和“和为贵”调解室，实现了德育与制度约束的协同发力，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在产业层面，曲阜依托“三孔”“尼山圣境”等重要文化资源，打造《金声玉振》等文旅演艺IP，振兴孔府印刷、楷雕等传统工艺，推动文化资源向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为孟子故里，邹城着力挖掘“母教文化”“浩然之气”等文化精髓，通过母亲文化节、儒学论坛等载体强化文化符号的现代表达。打造“孟子修学游”“孟母三迁路”等研学路线，使文化体验成为拉动消费升级的新增长点。在产业融合方面，邹城创新性地将孟子文化融入区域品牌建设，推出“邹城蘑菇”及菌菇产品、“善养天下”等，以文化叙事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全国食用菌十大主产区之一，邹城将小菌菇培育成年产值43亿元的大产业，带动农户26000多人种植，人均增收3万多元。政府引导企业从单一种植转向菌种研发、深加工、品牌营销等多环节发展，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规避了“内卷”，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个人致富与集体增收的统一。

临淄以齐文化的两创数字赋能为特色，依托数字经济的强劲赋能，深挖齐文化中的“变革开放、务实创新”特质，系统梳理以姜太公封齐、管仲改革、稷下学宫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齐文化基因库”；运用VR/AR、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活化稷下学宫、齐长城等历史场景，开发“齐都宝盒”等文创产品，让千年齐文化焕发科技魅力。产业实践中，临淄将物联网、大数据应用于智慧桑蚕农业与数字庙会，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以齐故城遗址为载体，规划“齐风古村落”“齐文化文旅小镇”，形成四季旅游产品体系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上三地是众多山东地市以文化人、以文促经、以经育文生动实践的典型代表。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精神资源，更是可转化、可增值的文化资本。文化符号与经济实体的深度融合，有效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人文是重要且稀缺的资源禀赋，文化振兴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支撑，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经之路。研究好人文经济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必修课。

（作者分别系山东财经大学校长、科研处处长）

破解网络时代的「文字失语」困境

□ 纪荣

在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流行语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流行于不同领域和群体当中。在网络空间，一个庞大的“文字失语者”群体正在被卷入焦虑的信息洪流之中，他们惯于使用形形色色的网络用语、符号表情包、网红文案，如“YYDS”“奥列给”“绝绝子”“ORZ”“XSWL”等，这些网络表达呈现娱乐化、同质化、简单化、碎片化特征。这种现象往往被人们称为“文字失语”。

如何定义“文字失语”？中山大学黄晓斌教授在其论文《网络用语对信息交流的影响》中指出的“信息传输的失真和交流的障碍”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流行在青年群体中间的亚文化现象，“文字失语”日渐弱化了人们的自由表达能力、日常社交能力、文字书写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挤压着人们独立思考和言语表达的空间，在不同群体中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

但值得肯定的是，网络流行语的频繁使用并不意味着故意制造交流障碍。一方面，网络流行语以其平民化、生活化、通俗化，较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生动幽默、简洁等特点，既方便了不同群体与网络新生代之间的交流，填补了他们之间的代沟；又突出了其表达效果，凸显了表达者追求求简的表达方式、追求求异的个性追求，以及幽默诙谐的话语魅力。另一方面，透过“文字失语”亚文化现象这扇窗口，我们可以更好地获取研究网络新生代成长成才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网络时代文字语言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进而有利于我们坚守主流话语阵地，牢牢掌握主流话语权。

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诸如“给力”“点赞”“出圈”“厉害了”“后浪”等带有正能量的网络热词也正在进入主流话语建构的视野，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的标题中。也正是主流媒体这种权威化的语言风格和平民化的表达方式拉近了人民群众与主流媒体之间的距离，既以喜闻乐见的活语方式让党的思想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又让人民群众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衔接，有效弥合了“数字鸿沟”。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它的负面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近年来，一些低俗的网络流行语也泛滥于人们的视野，解构着主流话语的权威性，有些话语缺乏知识含量与营养价值，影响着人们的主流价值取向。但是，对于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使用，以及“文字失语”现象我们也不应过于焦虑，应持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它，因为无论是汉语言文字的稳定性、灵活性、包容性，还是中华汉字文明之历史底蕴的深厚性，亚文化更新迭代的频繁性，青年群体的年龄增长成熟性等因素，“文字失语”的困境最终会随着历史与时间的变迁迎刃而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网络流行语进行合理、科学的引导和规范恰当的运用。

坚守主流媒体话语阵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11.23亿，青年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5.4亿。面对如此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主流媒体作为联结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既要肩负起弘扬社会正气，正确引导价值观的重大责任，又要积极关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成功的特点和规律，更要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积极从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群体中汲取话语资源，关切网民的精神需要和文化品位，通过对权威性、严肃性文件话语的解构和再编码，实现自身在活语内容、方式、体系上现代化、平民化、生活化转型。此外，应合理化、规范化引用一些极具正能量的网络词汇、语汇，主动设置一些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公共议题供人们参与、讨论、评价、反馈。与此同时，应时对一些粗俗化、负面性，以及带有“软色情”性质的活语进行监督、批判和治理。

引导青年纸质阅读学习。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9%，较2023年的59.8%增长了0.1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22.5%，较2023年的23.1%下降了0.6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17.1%，较2023年的17.5%下降了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0.6%，较2023年的80.3%增长了0.3个百分点。可见，电子阅读对纸质阅读空间的挤压已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多项研究表明，阅读的介入直接影响读者在阅读时大脑的活跃程度和记忆的留存度，纸质书也更有利于提升读者的理解能力。必须重视构建全民阅读的氛围和环境，如举办本地特色读书会、本地大型书展市日活动、城市读书大讲堂等，发挥世界名著和我国历史典籍涵养思想智慧、树立人生价值和培养逻辑思维功能。监督出版行业，打造精品力作，激发阅读兴趣，引导青年进行高质量阅读，以提升青年语言表达力、语言组织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为目标，在促使青年形成良好的纸质阅读习惯中改变他们日常交流“词穷”“语乱”现状，培养青年深度思考习惯。

推动网络文化创新发展。“文字失语”是网络发展衍生的亚文化现象，是由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媒介技术的变革所带来的文化范式变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因此，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从文化的特性出发，通过文化的路径破解这一“文化难题”。我们看到，当今网络空间涉及的内容千奇百怪，网络文化的丰富多形前所未有。在各式各样的移动智能终端上打开抖音、快手等主流短视频软件，个人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化的消费者。人们普遍陷入向尼尔·波兹曼所言“娱乐至死”的娱乐消遣价值导向，“泛娱乐化”的短视频消费更带来的感官刺激和消费欲望，而透过网络推文“白屏黑字”的走马观花式阅读，难以使浅显的阅读变为理性的思考。网络空间各种文化形态也陷入“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的悖论。所以，推动网络文化创新发展，加快“文字失语”的亚文化现象更迭周期，在坚持文化多样化发展原则和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前提下，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创造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力求打造反映和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精品。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走向数字时代的“善治”

□ 崔凤祥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驱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政府全面部署数字建设，不断推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社会情境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平台搭建等方式为社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需从多维度协同发力，强化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格局，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持续夯实数字技术的应用基础，从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度与效度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实现了治理手段创新与治理效能提升，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精准回应民众需求。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数字是手段，治理是目标，运用数字技术有助于解决传统治理技术和手段不精细的问题。通过对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收集、筛选、传输、处理、分析，及时获取反映个体诉求与社会广泛关注的信息，精准研判、及时回应，为高质量的服务决策和供给提供依据。“互联网+”的一站式数字信息网络或者平台，打通了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精准回应了民众的实际需求，重塑社会治理的价值。例如，教育部门借助大数据分析不同地区的人口数据，全面掌握相关的教育信息和指标，从而精准诊断教育需求，为教育管理者进行学区规划、学位供给和教育资源精准配置提供翔实依据。

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以数据化思维，融入线上平台，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打破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隔阂，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治理效能。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空间的运行独立于传统物理与社会空间，并支配物理和社会空间的资源分配，改变传统部门行业间数据重复采集报送和线下多环节申请、报批、答复等信息往来模式，全程线上操作，畅通政务、医疗、教育、交通等职能的协同渠道。国务院推动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即技术赋能效能提升，各地在落地“高效

办成一件事”中，线下的“一窗受理”与线上的“一网通办”配合，各部门间信息共享互认，大幅提高了服务效率。

数字技术促使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赋能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并由此形成数字社会治理与传统治理的根本区别，即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数字技术为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提供契机。数字技术便捷、高效，减少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成本，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数字治理中，政府是关键行动者，市场、社会、公众都是重要的参与者。通过数据的连接，相关主体在数字时代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和分工协作关系，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中。例如，政府要充分发挥其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政务服务平台搭建以及信息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公共服务平台和智慧社区建设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众通过在线投票等方式提高了参与社会治理的便捷性，增强了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意愿。通过数字技术，多元主体责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更加负责更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数字赋能的“正负二重性”

技术具有正负二重性，数字技术亦然。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技术动力的同时，自身的特性以及与社会治理耦合互嵌的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

伦理困境。数字技术在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个人隐私泄露、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伦理风险也随之出现并逐渐加大。一些企业、机构甚至个人，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随意收集、非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行踪轨迹、地理位置、家庭地址、工作单位等与个人流动密切相关的信息以及个人的朋友圈、家庭关系等相关网络信息等，利用获得的信息进行骚扰甚至违法活动；社会成员在数字化平台中极易获取“碎片化”信息，造成个人认知的片面，进一步导致不同观念、立场之间群体的对抗与博弈，破坏网络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治理生态，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造成冲击；在数字技术辅助社会治理的逻辑下，不能熟练运用数字技术的群体，可能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弱势群体。

公共价值困境。在社会治理中，对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会滋生技术治理“逆向适配”，一旦技术不符合实际，反过来要求政府脱离实际满足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增加了行政负担，进而导致“效率悖论”，使技术工具失去了原本的先进性；互联网和科技公通过访问控制技术、加密算法技术等，对收集后的数据进行访问和使用上的控制，实现数据垄断，进而垄断市场、操纵用户，破坏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政府在数据掌握权方面的优势逐步减弱，威胁政府的社会治理主导权；智能系统会根据个体的浏览轨迹收集人们的行为习惯、兴趣偏好，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精准化信息推送，导致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被削弱，弱化了人的价值判断和甄别能力。

形式主义困境。数字技术最终服务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服务于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并不会改变技术本身作为“工具”的本质。数字技术的充分应用是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创新实践中，社会治理在技术应用方面出现“内卷”趋势，各层级社会治理的数字技术应用不断升级加码，应用过程也出现偏离技术赋能理性的趋势，出现了痕迹管理、虚拟政绩等形式主义问题。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有广泛的空间，但并不代表数字技术是万能的，不是所有社会治理问题都能够数字化，数字技术应用有其自身的限度，且数字技术的应用也需要遵循技术应用的内生规律。

理性全面看待数字技术的效用

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理性性、全面地看待数字技术的效用，既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又要采取措施规避其潜在风险。

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中的“主心骨”“前哨堡垒”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胜势。积极推进“党建+数字化”的模式，提升社会治理的服务效能。党建引领下，政府尽力创造空间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模式。利用企业所具备的技术实力和社会组织所提供的专业化服务能力，积极推动政企、政社合作，在数据平台开发、数据利

用方面与企业共同探讨，就特殊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依托企业或社会组织所具备的资源优势实现治理方式的优化和革新。同时，政府主动在数字平台公开信息并主动与公众交流沟通，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并自觉接受其监督与评价，从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治理效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真正价值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围绕个体需求和社会痛点，从社会有效运行的底层逻辑出发，用数字化手段变革治理体系朝着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方向运行，提高服务能力，让百姓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与成果，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政府部门内部也要建立扁平沟通的互动理念，推进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使民众既可以通过“民情恳谈日”等活动直接反映诉求，又可以借助App、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工具上报诉求，增加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不断夯实数字技术的应用基础。一方面，推进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国家在产业生态、算力供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加快了全国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有助于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高效协作，方便推进社会治理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提高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另一方面，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面向不同群体，构建科学的数字素养教育框架，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应举全社会合力，将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纳入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真正实现数字赋能于民，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更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打造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数字化格局。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并不断嵌入社会治理进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乃至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要把握数字技术发展前沿，在数据、平台、用户等要素中提升数字思维，以数字化助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实现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走向数字时代的“善治”。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